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5月16日 (第237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为美构建全球技术联盟支招

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还应当在技术领域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

中美关系

美专家称拜登复制中国基础设施奇迹的期望难以实现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5月5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等的文章称，拜登复制中国基础设施奇迹的期望可能无法实现。

文章称，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的计划，以在美国修复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但美国面临着如何为此类投资买单的两难境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融资机制与美国有根本不同。因此，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经验只会凸显美国在这些方面竞争是多么困难。

拜登的提议在财务上的可行性已经受到了诸多质疑。他的提议包括提高资本利得税率、征收新的遗产税、改善税收征管等。然而，这些提议要么面临着坚定的反对，要么面临着可行性的严格限制。对拜登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他不能增税，他将不得不用债务来支付大部分新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财政部的信誉将会遭受压力。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地方政府有机会建设和修复基础设施，在中国开始面临与西方国家相同的财政约束的情况下，或许可以缩小与中国的差距。

除了可能造成不稳定的通胀压力外，依赖美国国债的可靠性可能和中国的土地融资一样是个好办法。但前提是美元仍然是事实上的全球储备货币，否则这种方法也不会一直奏效。

拜登应考虑在印太地区强调国家价值观的弊端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5月3日登载该智库高级国防分析师德里

克·格罗斯曼 (Derek Grossman) 的文章称, 在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特定背景下, 拜登政府应考虑在印太地区强调国家价值观可能带来的弊端。文章摘要如下:

如果拜登计划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那么一些关键国家将更愿意在中美竞争中协助美国。譬如, 越南寻求美国的支持以在南海对抗中国, 但是河内不喜欢美国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此类批评可能会削弱战略关系。

然而, 早期迹象显示, 拜登可能会优先考虑国家价值观。拜登已经承诺在今年年底前召开民主峰会。这意味着越南和半威权的新加坡——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二者视为与中国竞争的关键伙伴——可能不会受邀参加。此外, 《指南》有关盟友的部分也未提及美国的长期安全伙伴菲律宾和泰国。

拜登曾希望“四方安全对话”(Quad) 在印太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很难想象 Quad 会邀请一个非民主国家参与对话。在该机制中, 新德里越来越担心民主党中的进步派寻求说服白宫不与莫迪政府结盟。共同价值观的裂痕可能会冲击 Quad 的核心精神, 使各方难以开展合作对抗中国。

拜登谴责和制裁缅甸政变的举措并未获得印度、泰国等国公开支持。华盛顿将不得不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向这些国家施压, 以及这样做是否会损害在其他领域针对中国的合作。强调价值观高于利益的做法也将导致美国与缅甸和老挝接触的可能性更小。

约瑟夫·奈谈中美“合作性竞争”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5 月 6 日登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文章《中美竞争的逻辑》称, 中美关系是一种“合作性竞争”, 美国对华政策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两国能否在生产全

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竞争。

文章称，拜登总统最近在国会的讲话中称，中国正在试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但美国才会赢得未来。若处理不当，美中之间的竞争可能是危险的；但若处理得当，与中国的竞争可能是健康的。

拜登对华政策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中国，但也取决于美国如何改变。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这需要投资人力资本和研发。中国的实力在增长，但也有明显的弱点；而美国则有重要的长期实力优势，如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能源自给等。美国在国际金融、人口和关键技术方面也掌握着优势。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向该地区水平转移，但亚洲有自己的内部权力平衡。中国的实力被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平衡，而美国则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美国保持其联盟关系，中国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地区的前景渺茫，更不用说主宰世界了。

但与中国竞争只是拜登面临的问题的一半。中国、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面临着很多相同的问题。在某些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但应对一些新的跨国问题，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在许多跨国问题上，提高他国的能力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美国也会受益。因此，美国必须在中国竞争的同时与其展开合作。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两国能否在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中美关系是一种“合作性竞争”，需要给予矛盾的两方面同等关注。

美专家为美构建全球技术联盟支招

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还应当和技术领域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兰·戈登堡（Ilan Goldenberg）等 4 月 30 日在《外交官》杂志撰文称，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还应当在技术领域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文章提出一个基于三个中心环节的行动框架，旨在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聚合科技领先的民主国家。

文章称，中国正在对 5G 电信、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战略技术进行重大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术可能会转化为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同时，中国还努力创建新的区域经济机制，并试图重塑现有的国际机制，以促进对中国技术公司的友好环境。

美国可以采取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单独应对这一挑战，但更为有效的应对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召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以协同的方式来对待技术政策。这些组织可以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荷兰、韩国、英国等。由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因此需要一种可重复但具有灵活性的方法，建立共同的立场和准则。

为此，戈登堡等提出了一个“三足”框架：整合战略视角；协调监管制度；深化经济和技术合作。美国可就每个方面与技术领先的民主盟友建立双边或多边的针对中国的工作组。

第一个工作组主要由国务院及其外国同行领导，将重点关注整合对中国的战略观点。这将是一项挑战，因为美国的许多伙伴对中国有不同的威胁认知，这些国家的公众对中国和美国的全球角色也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不是所有的分歧都能被克服，但对于

威胁、挑战和机遇的共同理解对于实现有效合作是必要的。

二是协调监管制度。美国旨在保护美国技术的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政策正在迅速改变，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工作组将作为一种手段，与盟友协调和沟通政策的变化，并消除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如哪些技术被认为是敏感技术，如何最有效地保护技术优势。这可以为简化双边科技部门投资和扩大《外国投资风险审查和现代化法案》（FIRRMA）的“白名单”（使监管制度达到美国标准国家的外国公司免受额外审查）铺平道路。财政部应领导美国方面的努力，并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出口控制专家和官员纳入进来。

三是继续深化经济和技术合作，以提高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的地位，并为美国的伙伴提供经济激励、利益和针对中国投资和技术的替代选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和国家安全高级主管的领导下，美国方面将包括来自国务院、商务部、科技政策办公室、国家实验室和国防创新小组的官员。这些官员可与外国同行一道，为就不同问题的合作奠定基础，如制定技术使用规范、供应链弹性、联合研发、人力资本交流和创建技术投资机制等。

文章称，上述协商框架侧重于弥合差距，并就如何处理与崛起的中国的地缘战略技术竞争达成一致，可以为各方带来经济和安全利益。该框架可以在双边基础上或在与欧洲和亚洲主要伙伴的小集团中进行，并可以为技术领先的民主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奠定基础。

美国外交

美媒称拜登可在“拜普会”前重新定位美俄关系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5 月 2 日载文称，美俄两国领导人或将在拜登 6 月访欧参加“七国集团”和北约会议期间举行峰会。峰会的基调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拜登仍可以以四个战略支点来重新定位美俄关系：

第一，峰会等高层外交具有象征意义，偶尔会取得重大突破，但拜登不应高估与普京的峰会，而应优先考虑两国政府间常规、富有成效的沟通，以及就摩擦进行工作层面的谈判。

第二，积极减少美俄陷入军事冲突的机会，包括恢复《开放天空条约》，结束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虽然美俄军队未在叙利亚正式交战，但美军与俄雇佣兵发生了冲突。此外，美国还应避开俄在东欧的部署，特别是在乌克兰。

第三，依靠良好的防御和道德领导力，而不是试图胁迫，尤其是过度使用制裁，这并不是真正改变目标国家行为的好方式。对俄制裁大多被忽视，当普京认为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俄罗斯也会忽视额外的制裁。

第四，美国对俄战略的主要目标必须始终是和平。冷战已经结束，但美俄仍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核武库。在最坏的情况下，破坏和平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拜登不应忽略这一现实，并应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更加谨慎。

美媒：拜登重拾美“老政策”将无法终结巴以冲突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5 月 13 日载文称，在巴以问题上，

如果拜登不改变美国对以色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冲突将无法得到最终解决。文章摘要如下：

对于日前爆发的巴以冲突，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熟悉得令人沮丧的立场：毫无意义地呼吁双方克制，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并以华盛顿对其最亲密的盟友、最大援助受援国之一的以色列没有影响力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为掩护。

拜登政府似乎决心不把中东地区、尤其是巴以冲突作为优先议程，但现在却面临陷入长期冲突的可能。虽然巴以是当前这场戏剧的主角，但美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外部角色。

美国在该地区采取基于人权的政策将更符合拜登的整体外交政策议程。它可以扭转目前的消极趋势，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在此基础上为未来的和平作出努力。要实现这一点，仅扭转特朗普政府此前的行为是不够的。前几届民主党政府所支持的现状，已经包含了一个颠倒的激励结构，它不利于和平，特别是保证以色列不受惩罚，从而鼓励了以色列政治中最极端的倾向，并导致美国投入了大量外交努力和资金。

美国的“自动驾驶政策”将会失败。虽然不是华盛顿发起新一轮暴力，但进一步的不公正和冲突与其不无关系。目前的冲突也许会停止，但如果美国不改变做法，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再次爆发，且接触条件会进一步恶化。美国在寻求将精力集中到其他地区的同时，将不得不承担越来越沉重的中东负担。

拜登不应将地缘政治定义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14日登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将今天的地缘政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

冲突，这样做既会让美国的对手更强大，也会削弱美国的盟友，且“我们对抗他们”的方式将导致无法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

迄今为止，拜登的治国方略集中在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冲突上。他上月底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将美国的对手称为“世界上的独裁者”，并誓言它们“不会赢得未来”。这种做法可能有助于团结美国人，但这是一个战略错误。自拜登就任以来，美国与中俄两国的关系都陷入低谷。鉴于国家利益不同，美中和美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严重紧张。但最近敌对情绪的升级增加了外交关系破裂甚至更糟的风险，并阻碍了在共同挑战上的必要合作。

如果美国的大战略集中于打倒“非自由主义”大国，那么美国几乎很难在任何问题上与中俄合作。拜登政府不应发动意识形态上的攻击，而应针对中俄构成的不同威胁，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回应，同时寻求与两国开展务实合作。

就中国而言，美国及其盟友应反击其“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迁移关键供应链，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优势，并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针对俄罗斯，其目标应该是抑制和制裁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扩张主义、网络攻击和干涉外国选举。

美国不应推动中俄走到一起，而应该让俄罗斯摆脱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就像美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接触中国以削弱共产主义集团一样，拜登及其欧洲盟友应该努力吸引俄罗斯转向西方。

美学者称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止源自防务开支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 5 月 7 日登载兰德公司美国大战略分析中心主任米兰达·普里贝（Miranda Priebe）的文章称，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仅源自防务开支，还来自其他促进国家安全的联邦开支，如基础设施开支。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最近提出了 7530 亿美元的国家安全预算，其中国防部预算占 7150 亿美元。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需要增加开支，才能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然而，只关注国防预算的数字会忽略其他促进国家安全的联邦开支。鉴于国内面临的各种挑战，现在是考虑扩大对国内和国家安全都有好处的开支的好时机。

基础设施开支就是一个例子。一些评论人士以中国目前的行为或声称中国可能在未来几年“入侵台湾”为由，强调在近期增加国防开支。然而，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一个美国需要无限期管理的安全问题。因此，美国的预算选择应该从眼下的国防开支转向为应对持续挑战而进行的投资。拜登拜登政府承认这一现实，认为其基础设施计划将有助于美国在未来几年与中国竞争。

但基础设施开支还以另外方式两种为美国应对中国带来的长期挑战做准备。最直接的方式是，基础设施开支提高了美国军事设施的韧性。这些设施与其周围社区共享关键的基础设施。例如，对当地电网的破坏就有可能导致军事设施的运转中断。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可以确保做好军事准备，并限制战时行动中潜在的失败点。

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一个不那么直接但仍然重要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的规模使美国能够在国防上作出巨额开支。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也会影响美国未来能够承担的国防支出水平。拜登政府的计划包括对高速公路、桥梁和港口等核心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及对医院和学校等开展更广泛的公共投资。现有的经济学文献表明，所有这些投资都比军事开支更能促进长期增长。

为了有必要的资金来保护美国安全，无限期地应对挑战，美国必须进行更广泛的投资，以支持美国的军事力量和促进持续的

经济增长。因此，美国应该超越年度国防预算，着眼于更广泛的方式来促进长期国家安全。

美国进步中心为拜登政府完善其外交政策建言

美国进步中心（CAP）近日发文审视了政府的外交举措，就拜登团队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在五大领域内进一步完善给出了建议。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国家安全工具与机构的重建和再平衡。对军队的过度依赖加之现有组织架构面对新挑战的不匹配，表明将美国国家利益单纯定义为免受外国威胁、保证国家安全的做法需要转变。为重塑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拜登政府还应：削减国防部预算，增加对国务院的资源投入；调整国土安全部的工作方向，改变单纯以威胁为导向的模式以适应当今需要

第二，践行民主价值观。拜登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扭转特朗普政府对国内外“民主和人权”的损害。不过，在践行民主价值观上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空间，拜登政府还应：基于 6.25 万上限努力接纳尽可能多的难民，在下一财年重建安置 12.5 万难民的能力。此外，政府应加入有关国际公约并与伙伴合作，加强对相关体系的投资。

第三，负责任地结束战争。尽管拜登政府不可能在上任百日内结束战争，但拜登政府采取的一些初期步骤，例如宣布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提出重启伊核对话、结束对沙特在也门实施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支持等。为早日实现目标，拜登政府还应：取消对埃及和阿联酋的军售，并进一步限制对所谓“残暴和非自由主义”政权的安全援助与军售。加快完成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译员的特殊移民签证。

第四，重新调整美国的全球关系。在重新调整美国的全球关系方面，拜登政府应优先考虑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尽早接触，以巩固对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至关重要的关系。为重塑美国在世界的角色，拜登政府应该：通过举办美非峰会等方式增加美国与非洲国家的接触。重新审视美国与中东的关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巴以矛盾并鼓励沙特与伊朗展开合作。通过多边方式处理对华贸易问题。

第五，应对全球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加速带来的威胁和以移民和新技术为代表的其他全球性挑战是政府的首要任务。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移民治理问题，拜登政府还应：通过发起全球反腐倡议领导国际反腐败合作。任命国家各个安全部门或机构的首席技术官员，应对科技带来的变化。撤销特朗普政府切断美边境避难通道的第 42 号法令，并采取更多措施，为寻求安全的民众提供充分的避难通道。

美国政治/其他

“买美国货”政策在长期会损害美国的竞争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网站 5 月 4 日登载该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威廉·赖因施 (William Reinsch) 的文章称，拜登的“买美国货”政策未必是一项好政策，长期来看，可能会影响美国相关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文章摘要如下：

CSIS 以美墨加协定 (USMCA) 为案例对供应链中的原产地要求进行的研究表明，要求美国含量的规则会在国内创造就业，但此举的代价是降低受影响行业的全球竞争力。企业将不得不花费时间和金钱来重组其供应链。从长远看，美国未来的竞争力有赖

于美国向世界销售的能力。如果“买美国货”真的发挥作用，其将成为美国的负担而非资产。

“买美国货”的政策是否奏效还与其涉及的行业范围和实施规则有关。对大多数部门来说，联邦采购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联邦采购要求过于繁琐，很多制造商会放弃向政府出售，转而将重点放在盈利更多的私人部门。

此外，如何规定“美国产品”零件和组件的计算方式也有重要意义。目前的规定是含有至少 55% 美国生产的部件被认定为是美国产品。这为外国输入留下了很大空间。如果拜登政府通过消除例外情况、改变计算方式来推进“买美国货”的进程，那么该政策将产生比现在更大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多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与美国的国际义务相悖。美国签署了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这使其有义务向其他协议签署国开放政府采购。否则美国就会受到投诉，并最终要对部分国家进行补偿。

拜登“基础设施”计划面临的四大问题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5 月 7 日登载该智库联邦预算中心政策分析师大卫·迪奇 (David Ditch) 的文章称，拜登政府标榜其“美国就业计划”的一项“基础设施”计划，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庞大的税收和支出计划，它将扩大联邦在许多领域的权力和控制。文章认为，该计划存在四大问题：

第一，破坏性的增税。“基础设施”计划将在未来 15 年对企业增税 2.7 万亿美元。这将减少企业雇用新员工的动机，并使企业家不大可能冒险创办新企业。长此以往，这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这意味着就业机会减少和工资降低。增税将使美国企业的税率在主要经济体中高居第二，将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第二，联邦基础设施支出未能创造就业。该计划中的基础设施部分走的是 2009 年奥巴马签署的刺激法案的老路。有研究表明，奥巴马的刺激法案中基础设施支出的增加导致建筑工人从私营部门的项目转向联邦项目，这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此外，联邦项目的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往往更高，从而减少了与支出有关的项目和就业的数量。

第三，中央计划的影响。该计划将促使联邦政府更多地参与地方基础设施，以及对能源、制造业、住房等私营部门的微观管理。这将意味着联邦政府从私营经济中获取巨额资金，并将其重新分配给政治利益集团。华盛顿在地方决策上获得更多发言权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地方官员比联邦官员对选民更负责，也更符合地方的需求和偏好。

第四，浪费的基础设施优先事项和虚假宣传。高速公路和桥梁是美国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拜登的计划中仅 4% 的支出投入高速公路和桥梁，却将在公共交通上投入更多，而后者的客流量不足高速公路客流量的十分之一。对不适合美国地理环境的交通方式的投入将导致巨大的浪费。此外，该计划还包括与基础设施无关的巨额支出，如数千亿美元的企业福利、“绿色”补贴基金、对电动汽车的巨额补贴以及医疗补助福利的扩大。

拜登的“大政府”解决方案可能会适得其反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 5 月 5 日刊登美国人生活调查中心 (SCAL) 常驻民调学者和舆论主任丹尼尔·考克斯 (Daniel A. Cox) 的文章称，过多的政府干预看似受到民众欢迎，但实际上会适得其反。文章摘译如下：

继 1.9 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之后，拜登近日又推出了两

项全面的立法：一项 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和一项 1.8 万亿美元的家庭援助计划。拜登提议为经济注入总计近 6 万亿美元的资金，而这些刺激方案目前都受到公众的广泛欢迎。

盖洛普民调显示，大多数（54%）美国人支持政府做更多来解决美国当前的问题。该数字比十年前大幅增加，也是自 1992 年以来的最高值。

最明显的解释是，在过去 14 个月里，政府在经济援助和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美国人广泛认可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千禧一代平均比婴儿潮一代在同样年纪积累的财富要少得多。因此，千禧一代可能更不担心政府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而更关心政府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此外，特朗普任期内，共和党内的经济自由派和赞同小政府的保守派的影响力下降。一些共和党人甚至提出了自己的大规模支出计划。

如果说赤字开支和不断增加的债务目前并未引起保守派的愤怒和公众的惶恐，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显示，48%的美国人担心拜登政府开支过多。一些著名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准备通过拒绝提高债务上限来反对增加开支；自拜登上任以来，普通共和党人对赤字开支的警惕性大大增加。

目前更多政府干预的时代很可能是短暂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更多政府干预的需求是周期性的。有学者发现，公众对支出的偏好与支出的总金额成反比。也就是说，当国会支出很多时，公众对支出的支持下降；当支出水平低时，公众就希望政府更加慷慨。

这意味着，当拜登试图通过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来打击种族不平等、应对气候变化和修复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时，民众对积极政府的支持可能会帮助他。但在通过这些政策时，拜登也有可能削弱公众对政府行动的支持。

后疫情时期美军将面临五大关键变化

美国专 War on the Rocks 网站近日发布文章称，至少有五个关键的变化将决定五角大楼领导人未来的选择和决定：

第一，网络和太空的优先级将高于陆地、海洋和空中。疫情之后，与保护美国免受来自海陆空的外部威胁相比，保护本土免受新兴非常规威胁将变得更加重要。对美国国防部来说，这意味着要更加重视网络和太空领域。为了帮助美国抵御这种威胁，五角大楼几乎肯定需要大幅扩充网络任务部队。新成立的太空军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保护美国民用和军用太空资产。

第二，对前沿防御的依赖将会减少。长期以来，前沿防御一直是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但随着美国将重点放在应对本土面临的灾难性威胁上，这一战略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一个以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和经济衰退为特征的疫情后世界，美国将继续捍卫其最重要的海外利益：保持北约的活力，保护东欧不受俄罗斯的影响，支持以色列，并遏制亚洲的冲突。但是，在中东、阿富汗、非洲、甚至太平洋的一些地区，美军将减少兵力，甚至完全撤离。

第三，预备役部队将变得更加重要。本土防御变得日益重要意味着美军预备役部队的重要性将匹敌现役部队，这将彻底扭转两者之间的传统关系。与现役部队不同的是，预备役部队可以同时为应对国内危机和执行海外军事任务提供关键能力，这为抵御外国传统威胁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第四，遗留项目和终端力量将大幅削减。预算的急剧缩减，对陆、海、空领域的重视程度的下降，以及前沿存在的减少，意味着航空母舰、两栖舰艇和载人战斗机等昂贵的传统平台可能面临严重削减，有些项目可能会被彻底取消。但这一次，我们不应在在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之间分摊削减人数，而是应该保持甚

至增加预备役部队人数，他们为应对国内和国际危机提供了重要能力，而且维持费用较低。

第五，美军的威望将会降低。疫情之后，美军还将面临深刻的文化挑战，因为其社会地位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军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然而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人们忽然发现，医生、护士、卡车司机和杂货店店员等此前默默无闻的人在保持国家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之后，美军从美国民众那里受到的吹捧可能会减少。

过去十年来美人口变化将影响国会席位划分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大都会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威廉·弗雷（William H. Frey）的文章称，过去十年来美国人口发生的变化将对国会席位的重新划分产生影响。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有关国家、地区和州人口以及众议院席位重新分配的关键发现如下：

第一，201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第二低的时期。过去十年来美国出生人口数量下降，死亡人口上升，移民水平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部分反映了受经济打击严重的千禧一代推迟结婚和生育，以及与毒品和大流行有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同时，美国人口继续老龄化，这将进一步导致自然增长率降低。这表明，美国需要增加移民数量，以防止人口增长率未来持续严重下降。

第二，大多数州都出现了增长放缓。37 个州在 2010-2020 年的人口增长率低于此前十年，13 个州的增长率高于此前十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加州。加州过去十年来人口仅增长了 6.1%，这是该州历史上人口增长率的最低值。加州的人口增长放缓反映了国外移民的减少以及人口向外迁移的增加。

第三，华盛顿特区的高增长率可能代表了其他城市的增长模式。在过去十年中，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增长了 14.6%。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华盛顿特区也受益于十年前的人口增长，当时由于大衰退导致郊区和中小城市的房产和劳动力市场停滞，年轻的千禧一代涌入大城市。今年下半年其他城市的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时，很多其他城市可能会像华盛顿特区一样人口出现大幅增长。

第四，“阳光带”各州人口现在占全美人口的 62%。伴随着 2010 年以来全国人口的低增长的是人口向南部和西部“阳光带”迁移。过去十年来，南部和西部的口增长率分别为 10.2% 和 9.2%，远远超过中西部（3.1%）和东北部（4.1%）。

第五，七个州的众议院席位将发生变化。所有增加众议院席位的州都位于南部和西部：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俄勒冈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丢失席位的五个州位于中西部和东北部：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其他两个丢失席位的州是加州和弗吉尼亚州。

第六，选举人团的增加可能不再有利于共和党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三个“阳光带”州——加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在选区重划中增加了最多席位。在最近三十年中，很多“阳光带”人口增长发生在西部和南部的内陆地区。国会席位的累计变化不仅使得克萨州和佛罗里达州获得更多席位，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也获得了更多席位。这种转变的政治影响不应被忽视，因为重新分配增加了这些州选举人团的影响力。二十年前，增加席位的“阳光带”州一直给共和党人投票。但是，这些州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已经或很快会转向民主党阵营。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